

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 何以生成与应对

——基于大国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解释*

周 超

内容提要：如何解释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生成是当前世界政治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对此，文章搭建一个大国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生成的宏观框架，建立对应的类型学，通过负面、半负面与正面案例比较以提供一个机制加因素的演化性解释，该框架认为，促成两国战略竞争关系的核心动力是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错位机制的驱动在于两国以全球化高度复合依赖为背景变量、国内政治经济利益格局为前置变量，随着时间的演进，两国关系中经济与安全作为两大核心变量持续联动并结合多个因素作为干预变量；引发美国通过社会动员与国内政治机构的中介变量对华进行经济与安全的复合竞争，最终导致出现两国经济—安全联动螺旋失衡的因变量；即经济竞争加剧安全冲突，削弱政治互信，政治与安全逻辑试图压倒经济逻辑，两国战略竞争关系正式生成。对此，中国需要充分吸取历史启示并加以应对，着力实现两国产业结构深化互补、第三方市场与安全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双边安全深度合作，同时辅之以社会文化交流与全球治理合作，进而推动中美关系迈向多维共同演化，由此产生大国关系互动的革新意义。

关键词：大国关系 大国战略竞争 中美关系 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 社会演化

作者简介：周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20 级博士研究生

* 感谢人大—复旦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论坛诸位老师和学界各位师友的有益启发。本文是世界政治学路径和国际政治社会演化范式的部分运用，初稿在 2021 年海右博士生论坛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金仲华国研杯”获奖并宣读。感谢《当代亚太》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及建议，文责自负。

《当代亚太》2022 年第 1 期，第 59~100 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Bimonthly)

□ 当代亚太

一、问题的提出

在历史演变上, 尽管大国无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国际体系的常态, 即“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① 但自奥巴马政府以来, 中美在经济与安全两大关系联动上逐渐失去长期的脆弱性平衡, 成为两国“结构性矛盾与体系压力的由来”。^② 2017年年底以来, 美国针对中国重新挑动了“大国战略竞争”, 2012年年底以来, 中国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内外交错的压力 (cross-pressure); 中美关系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主导与机遇并存阶段, 诸如“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等概念已在政策界、学界与社会各界流行。尽管作为美国政治“异端者”的特朗普政府已落下帷幕, 但美国政治、经济精英对华战略竞争的霸权护持共识在短期内难以动摇, 这一点在拜登政府《2021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临时指南》《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2022年美国“印太战略”报告》等政策法规的出台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学术研究上, 基于大国关系是世界政治的恒久议题, 是塑造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国际规范与国际体系的最重要力量, 如何以一种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视角动态理解与分析当前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③ 两国战略竞争关系是如何生成的, 如何为这一生成关系提供一个更全面的机制加因素的演化性解释? 作为世界政治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 两国关系的演进作为一个大国关系的“经济—安全”联动案例具有哪些普遍与特殊意义? 基于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复杂性、整体性与辩证性, 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探讨将有极其重要的实践与理论意义。那么, 该如何应对与通往多维演化式未来?^④

本文以下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一是对已有的学界研究进行文献回顾, 运用世界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等宏观理论, 结合相关方法搭建大国关

① Tang Shipi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4-68.

② 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 第93页。

③ Tang Shiping, *On Social Evolution: Phenomenon and Paradigm*,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④ 尽管本文着重讨论以中国为主要行为体去应对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 但对此战略竞争关系的管理也特别需要美国承担对应的责任, 同时, 世界各国对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也具有共同责任。

系中“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生成的宏观框架，建立对应的类型学，初步认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生成由该机制驱动。二是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五十年演进为核心案例进行过程追踪，^①指出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导致两国战略竞争关系的正式生成及启示。三是基于时空条件约束选择美英、美苏、美欧、美日作为辅助案例，以负面、半负面和正面案例比较进一步确认错位机制在大国关系中广泛存在，并根据全文论证的启示，为应对中美大国战略竞争，迈向经济、安全与文化的多维演化提供相应建议。四是结语与展望。

二、文献综述与因果机制

作为研究热点，学界围绕大国关系的研究十分丰富，^②近年来，关于引发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研究有理论解释和现实描述两大路径。本文根据研究需求将这两大路径又划分为主流理论解释、经济驱动、安全驱动和复合驱动等四种路径，具体归因有意识形态冲突论、制度竞争论、经济竞争论和安全冲突论等，这些均有助于理解两国战略竞争关系何以生成与应对。

（一）关于引发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主流理论解释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演进提供了深刻、简约与抽象的理解，但部分文献在中美关系的研究中存在结构主义的束缚。^③譬如，结构现实主义在理论假定上认为两国体系竞争与冲突是决定性的且循环的，约

^① Andrew Bennett and Jeffrey T. Checkel eds., *Process Tracing: From Metaphor to Analytic Too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39.

^② 大国关系研究横跨多学科领域，主要著作参见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Michael Colaresi and William Thompson, *Strategic Rivalrie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James Lacey ed., *Great Strategic Rivalries: From the Classical World to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Yan Xuetong, “Bipolar Rivalry in the Early Digital Ag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3, No. 3, 2020, pp. 313-341.

^③ 在社会科学中，施（能）动者（agent）在本体论上优先于结构（structure），系统动态分析比结构单一决定论更重要，参见唐世平：《国际系统的影响：六大渠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第4页；Tang Ship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not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gains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atic in I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4, 2014, pp. 483-506; Mario Bunge, *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当代亚太

翰·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提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便认为中美必有一战, 展示了一个没有未来的国际政治意象。^① 针对冷战后元理论创新的匮乏, 国外两代新古典主义者试图打破体系 (结构) 单一决定论, 谋求“国家如何应对国际环境的行为以制定特定的外交政策”。^② 该理论以具体问题为导向, 对国际体系性质不做简单定性, 把国内政治作为重要干预变量纳入对外政策考量, 聚焦特定人物、时期与政策来分析中美关系, 虽解释力得到提高, 但没有揭示出中美关系动态演变中的因果机制。近年来,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为理解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生成进一步提供了理论解释。例如, 秦亚青提出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 该理论肯定实践本体观、后牛顿量子科学观与多元文化观, 为理解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生成提供了社会科学哲学维度的解释。^③ 阎学通提出道义现实主义, 以综合实力、国家利益、思想观念、领导类型与战略取向的类型学有力解释了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现状, 并认为中国更有可能成为王道大国。^④ 宋伟提出的位置现实主义是基于大国中心主义、理性主义与物质本体优先, 形成了实力关系、秩序关系—位置—界定大国整体利益—外交政策行动的因果机制,^⑤ 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的外交政策分析提供了理论化解释, 强调兼容机制体制对当代大国关系互动的重要性。“共生理论”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走向共生的可能未来提供了中国政治哲学维度的思辨,^⑥ 杨光斌提出的世界政治学挖掘世界深层过程性结构的研究路径和唐世平提出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范式, 也

①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 王义桅、唐小松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08~535 页。

② 参见刘丰、左希迎:《新古典现实主义: 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 载《外交评论》2009 年第 4 期, 第 127~133 页; 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构建与经验拓展》,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3 期, 第 113 页。

③ Qin Yaqing,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98.

④ Yan Xuo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2-101.

⑤ 宋伟:《位置现实主义: 一种外交政策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11~230 页。

⑥ 参见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 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1 期, 第 27 页; 金应忠:《再论共生理论: 关于当代国际关系的哲学思维》, 载《国际观察》2019 年第 1 期, 第 3 页; 任晓:《从世界政府到共生和平》, 载《国际观察》2019 年第 1 期, 第 16 页; 潘忠岐等:《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为本文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① 而在中层理论上，部分学者从均势论、霸权稳定论、^② 权力转移理论^③和威慑理论^④等角度，试图解释中美关系的战略竞争状态。例如，罗纳德·塔门（Ronald L. Tammen）等人从理论上认为大国权力转移充满风险，“挑战国的不满、赶超与核武器相结合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⑤ 综上，部分主流理论的研究是基于结构主义的束缚与静态的历史假定，需要进一步挖掘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动态演化性解释。此外，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等非物质本体论视角，^⑥ 论述观念性矛盾引发中美战略竞争关系，而由于物质本体具有优先性，在宏观历史动能情境下更适合作为愈发重要的补充性解释。

（二）关于引发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经济驱动说

近年来，学界关于中美经济关系引发大国战略竞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矛盾与冲突层面。例如，陈宇认为，美国经济战略界对中国角色界定发生巨大转变加剧了双边战略竞争。^⑦ 李巍认为，中美关系在加速步入战略竞争态势，^⑧ 主要是由经济与国际制度竞争驱动。雷少华认为，“推动大国竞争的本质是产

① 参见杨光斌：《世界政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2021 年版；Tang Shipi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② 刘胜湘：《从霸权稳定论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兼论中国的应对之策》，载《东北亚论坛》2015 年第 5 期，第 72~81 页。

③ 参见余珍艳：《权力转移理论与中美关系》，载《国际关系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109~122 页；曹文振：《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重塑——兼论中美权力转移下的冲突与包容》，载《太平洋学报》2013 年第 3 期，第 22 页。

④ 王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载《当代亚太》2014 年第 5 期，第 51~75 页。

⑤ Ronald L. Tammen ed.,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p. 17-33.

⑥ 参见王一鸣、时殷弘：《特朗普行为的根源：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载《外交评论》2018 年第 1 期，第 98~100 页；徐以骅指出，冷战以后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中宗教因素上升的趋势，参见徐以骅：《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刘永涛阐述了美国基于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主动设定假想敌的传统，习惯性为美国对外政策提供正当性，参见刘永涛：《建构安全“威胁”：美国对外战略的政治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6 期，第 118 页。

⑦ 陈宇：《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嬗变（1979~2020）》，载《国际观察》2021 年第 2 期，第 85 页。

⑧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0 页。

□ 当代亚太

业政策竞争，最重要因素是产业政策、尖端技术和市场规模”。^①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美贸易战一定程度加剧了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两国高精尖技术竞争在一段时间内会加剧双边战略竞争。^② 当前，两国经济长期性互补格局被人为因素改变，美国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导致中美贸易失衡并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竞争的升级”，^③ 只有压制中国科技进步速率，完成“脱钩加遏制”才能维持美国战略竞争优势。^④ 由于全球化重塑了全球产业结构，美国中、高端产业受挑战，低端产业去工业化让其战略界认为，大国战略竞争愈发聚焦在经济领域。但更为完整的事实是，美国依托美元霸权和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的主导地位，在统计数据上出现贸易逆差、在实际上赚取国际分工利润的高额顺差。这是由于金融资本与产业在全球双向流动的逐利，制造业占美国全国产值比重持续降低，而服务业占比极高，其经济霸权实际上也因制造业转移得到扩张。^⑤ 然而，美国政府把贸易逆差主要归结于中国利用“不平等”贸易关系实现崛起，其战略意图在于维持一段时间排他性全球化，等待美国国内政治裂隙弥合，以维持世界领导权。因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历来不是“单纯地以追求经济福利最大化为目的，也是一种潜在战略工具，经常被决策者用来服务国家安全战略”。^⑥ 这些研究揭示了中美关系近年来走向不稳定的核心动力，在此逻辑上可以理解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和战略竞争的根本动机，但相对忽视了双边经济压舱石作用仍然存在，^⑦ 气

① 雷少华：《超越地缘政治：产业政策与大国竞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5期，第131页。

② Kerry Liu, “Chinese Manufacture in the Shadow of the China-US Trade War”, *Economic Affairs*, Vol. 38, No. 3, 2017, p. 309.

③ 蓝庆新：《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分析》，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第5期，第68~69页。

④ 李向阳：《特朗普政府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第45~55页。

⑤ 韩召颖：《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研究》，载《当代亚太》2021年第2期，第84~108页。

⑥ 吴其胜：《安全战略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载《美国问题研究》2019年第2期，第103页。

⑦ 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美贸易额短暂下滑后持续呈上升趋势，全球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对中国的进口依赖性更大，美国对华贸易战的主要成本由美国民众承担。参见中国海关总署官网统计，2021年11月22日，<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34/302425/3986323/index.html>。

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领域需要包容性多边主义，依然会在全球化时代的中美竞争关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点与历史上任何大国关系存在不同，体现了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

（三）关于引发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安全驱动说

部分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似乎在安全关系上是一对假朋友，^① 双方从未涉及战略层面的高度互信，这一高度战略互疑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常量，如果管理不当容易引发大国战略竞争，例如，“台湾问题、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针对中国的举措、双方军事力量态势互动以及新兴技术发展的安全竞争”是两国战略竞争的主要推力。^② 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和平与发展，提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建设性倡议，针对美国也倡议新型大国关系，但两国在“缺少共有、均衡安全压力的情况下，美国主动把中国视为安全压力的来源”，^③ 推动两国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到来。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国关系演进历程中最敏感的亚太地区，安全竞争结合经济发展形成矛盾力量，加上“意识形态竞争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因素将决定既有安全矛盾是否会走向冲突”。^④ 因此，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某种程度上“成为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催化剂”，^⑤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关系因而被加强。也有学者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秩序没有提供美国理想状态的安全，需要革新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竞争。^⑥ 约翰·米尔斯海默也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在大国战略竞争时代是一种战略幻灭，必须考虑一个包含与中国进行经济与安全竞争在内的现实主义新秩序。^⑦ 此外，也有部分美国学者认为，中美安全关系结构性矛盾不是决定性的，质疑“单纯遏制中国的战略选项，

① 阎学通、漆海霞：《中美竞争前景：假朋友而非新冷战》，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3期，第3页。

② 姚云竹：《中美军事关系：从准同盟到竞争对手？》，载《美国研究》2019年第2期，第2页。

③ 张一飞：《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压舱石”的演变进程、内在动力与未来走向》，载《政治经济评论》2019年第2期，第92页。

④ 李岩、达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载《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第3页。

⑤ 凌胜利：《中美亚太安全竞争：缘起、内涵与影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4期，第165页。

⑥ Charles L. Glaser, “Why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Concept is Misguid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4, 2019, pp. 51-87.

⑦ John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4, 2019, pp. 7-50.

□ 当代亚太

认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应是努力防止中国成为敌人，以遏制中国和平崛起”。^①整体而言，在两国安全关系驱动中美大国战略竞争上，国外学界零和博弈视角居多，合作视角偏少，国内研究也主要立足于冲突视角，但更强调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总之，在高度全球化时代对国际体系压力持续削弱的背景下，以核威慑为基础的安全冲突不是两国大战略竞争关系管理的可行选项，传统安全领域也并非零和博弈，临时性安全合作对提高两国政治互信的作用不可忽视。

（四）关于引发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复合驱动说

就引发两国战略竞争关系复合动因的消极前景而言，王缉思和李侃如在2012年预见中美经济与安全关系将出现失衡的风险，并在《中美战略互疑》一书中讨论双边在领导层面、社会交流与军事关系上存在较高度度的不信任，将给中美关系发展留下深刻隐患。^②韩召颖通过对美国冷战后大战略设计的研究表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具有复合动力，其“大战略出现变革的首要动力是国际权力格局的持续变迁，美国国内政治具体环境和在任总统本人的个性特征”。^③阎学通认为，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将缔造数字时代的外交决策，导致中美进行较长阶段的战略竞争，产生一种和平但很不安定的国际秩序。^④而回顾中美关系过去五十年的历程，美国历届政府的安全战略与对华经贸政策制定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两国安全关系的变化往往决定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当前中美经济竞争不仅是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更具大国战略竞争的属性。基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驱动力的复杂性，吴心伯对中美战略竞争持辩证观点，认为竞争是21世纪国际体系变迁的主要动力，引发两国战略竞争的本质为“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竞争性质和形态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⑤董祚壮认为，美国在应对中国的

① 仇华飞：《美国学者研究视角下的当代中美战略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第102页。

② 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8页。

③ 参见韩召颖、黄钊龙：《目标设置、威胁界定与战略实践》，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5期，第30～67页；王浩：《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载《当代亚太》2021年第4期，第4～27页。

④ 阎学通：《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第24页。

⑤ 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96页。

挑战上，除了在实力与安全层面，体系影响力竞争也是其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驱动力之一。^① 而罗斯玛丽·富特（Rosemary Foot）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曾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并能够缓和中美安全等其他领域的紧张态势，美方对中美经济—安全关联看法的转变是当前中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② 这些研究表明，中美经济与安全联动的失衡让美国意识到中国带来更为广泛的战略竞争，已主动采用经济、安全、法律等政策工具予以应对。而作为中美博弈最为激烈的亚太地区，已深刻感受到经济—安全联动失衡的负面溢出效应。^③ 此外，就引发两国战略竞争关系复合动因的积极前景而言，学界认为，应对驱动中美大国战略竞争的各类原因仍然有不同的化解之道。王帆认为，“两国共同战略利益和经济相互依存、中国外交政策以及其他各国力量的牵制，使中美仍有避免新冷战的可能”，^④ 会“形成一种以竞争性共存为方向、新平衡的新战略”。^⑤ 特别地，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多个场合提出中美应该共同演化（co-evolution）无疑具有重大参考意义。^⑥ 杨洁勉认为，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修正者”，美国必须放弃“冷战思维和改变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者的对手意识，使两国在新形势下形成新的有效互动模式”。^⑦ 基于“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性、战略性和全局性，也具有困难性、复杂性和反复性”，^⑧ 在大国战略竞争阶段更需要辩证引导，片

① 董祚壮：《影响力制衡：主导国应对崛起国的关系性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8期，第106页。

② 罗斯玛丽·富特、艾米·金：《评估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政府对经济—安全关联的看法》，崔志楠译，载《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下）2019年第2期，第44页。

③ 参见 Avery Goldstein and Edward D. Mansfield eds., *The Nexus of Economics,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9-39; 贺凯：《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与竞争性多边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第60~82页。

④ 王帆：《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新冷战”抑或战略合作重启？》，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55页。

⑤ 王帆：《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性共存与新平衡》，载《和平与发展》2021年第4期，第1页。

⑥ 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加强磋商；二是把对常态化危机讨论提升为更全面的框架，消除紧张状态背后的原因；三是建立“太平洋共同体”。参见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517页。

⑦ 杨洁勉：《中美外交互动模式的演变：经验、教训和前景》，载《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第22页。

⑧ 倪世雄：《中美关系再出发：新的思考与展望》，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2期，第48页。

□ 当代亚太

面理解“所谓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十分轻率和危险”，^① 引发两国大国战略竞争的复合原因与应对需要审慎思考。尽管中美战略竞争导致亚太地区普遍性选择战略对冲，但美国与本地区其他大国联合制衡中国的可能性不高，^② 中美依然可以实现战略冲突管控，避免破坏性竞争，给世界局势稳定的希望。^③ 陆伯彬 (Robert Ross) 也赞同中美不会走向新冷战，而是一种新型竞合关系这一论点，^④ 认为中美关系依然保持了较大延续性。^⑤ 总之，大部分学者认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和美苏冷战类比性不高，^⑥ 因为“以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对抗标准去衡量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本身就设定一个极高门槛”。^⑦ 以上这些研究是从复合角度来看待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演进与应对，涵盖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层面，强调两国关系在新形势下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为本文建立整合性、演化性机制分析提供了重要参考。

(五) 因果机制^⑧

基于对既有丰富文献的研究，本文认为，当前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

① 石斌：《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实践意义》，载《史学月刊》2021年第1期，第7页。

② Zhen Han and T. V. Paul, “China’s Rise and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3, No. 1, 2020, pp. 1-26.

③ Zhao Minghao, “Is a New Cold War Inevitable?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3, 2019, pp. 371-393.

④ Robert Ross, “It’s not a Cold War: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US-China Relations”,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2, No. 2, 2020, pp. 63-72.

⑤ Zha Daojiong, “China-US Relations under Trump: More Continuity than Change”, *Asian Perspective*, Vol. 41, No. 4, 2017, pp. 701-715.

⑥ 尹继武认为，刻画中美战略竞争的概念需要存在一定区分度，对于冷战的特征要具体辨析，注意历史与当下存在的共性与差异。参见 Yin Jiwu, “The Cold War Analogy’s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Essence of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2, No. 2, 2020, pp. 257-269.

⑦ 节大磊：《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105页。

⑧ 本文对机制的理解借鉴了唐世平的定义：机制是在真实社会系统中，驱动变化或阻止变化的真实过程，机制和因素的互动产生了社会系统的结果，社会科学需要将因素与机制相结合进行讨论才更具解释力。赵鼎新认为，社会科学中机制有多种多样，存在宏观、中观与微观等不同层级，本文发展了社会科学中宏观因果机制的定义，即是一个结合因素才能发挥作用的宏观机制，也是一个微观的驱动力系统。当然，作者承认文章基于机制加因素的解释框架部分牺牲了机制论述与应对措施简约性。参见唐世平：《安全困境与族群冲突》，载《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3期，第7~8页；唐世平：《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第22~40页；赵鼎新：《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载《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1~20页；张长东：《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机制：微观基础与过程追踪》，载《清华公共管理评论》2018年第1期，第10~21页。

核心动力在于经济—安全关系联动的“错位机制”。^① 该因果机制的驱动是两国以世界历史演进为背景变量、国内政治经济利益格局作为前置变量，随着时间演进，两国关系中经济与安全作为两大核心变量持续联动，结合多个因素作为干预变量，引发美国通过社会动员与国内政治机构为中介变量，对华进行经济与安全的复合竞争，最终导致出现经济—安全联动错位螺旋失衡这一因变量；即经济竞争加剧安全冲突，削弱政治互信，政治与安全逻辑试图压倒经济逻辑，进入中长期风险主导的大国战略竞争阶段。一般而言，观察中美经济关系的宏观指标包含双边经贸规模及其全球占比、双边经济结构互补与依存程度、科技合作深度与广度等三大指标及其子指标。观察中美安全关系的宏观指标包含共同战略利益的广度与深度、军事演习等常规合作规模、频率与战略互信沟通渠道的数量等三大指标及其子指标。在当前中美经济—安全关系联动错位螺旋的现实下，双边安全关系已经退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政策界已经锁定中国为头号安全战略竞争对手，共同战略利益接近消失，双方没有临时性安全合作，环太平洋等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进入停摆，战略互信沟通渠道的作用下降。经济上，贸易战随着特朗普政府下台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双边经贸额度有所回升，并在 2021 年创下历史新高，^② 双边经济总量维持全球占比最高，^③ 但双方在高科技等战略性经济领域存在精准定位的“小院高墙”式博弈，美国不顾经济规律排斥与中国在经济（事实上也包含安全）上的复合相互依赖，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复杂性远高于历史上绝大部分大国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此外，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以“贸易前景理论”对二战以前的大国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爆发进行定量与定性比较案例检验，结果发现，

① “错位”这一术语借鉴于生物学，当肌体出现错位的时候，人作为一个生物系统将出现异常，从而损害人体的长期健康。中美经济—安全关系也类比于 DNA 的两条螺旋链条，它们在过去保持了长期较为脆弱的平衡，目前正在演化到一个“不健康”的错位阶段，逆转此阶段也需要较长时间。本文把“经济—安全联动的错位螺旋机制”暂译为 the Mechanism of Dislocated Spiral in the Economy-Security Nexus。

② 《我国前 11 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去年全年》，中国海关总署官网，2021 年 12 月 8 日，<http://www.customs.gov.cn>；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238184。

③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22)”，<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2/01/25/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anuary-2022>。

□ 当代亚太

大国战略竞争关系以战争结束争端为常态，证实了“进攻性现实主义”^①时代全球和平维系机制的匮乏。^②因此，基于世界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范式，由中美关系与大国关系^③的历史案例可搭建一个大国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生成的宏观框架，进行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动态”类型学推论，这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美关系中这一错位机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进而全面理解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生成及应对路径（见图1与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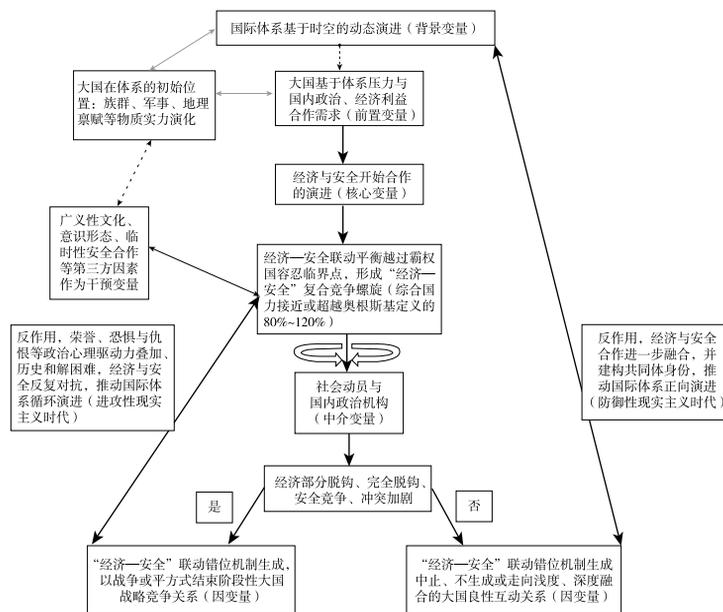


图1 大国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生成的宏观框架

说明：粗线表示核心机制，次粗线表示愈发重要的辅助机制，细线表示辅助机制，虚线表示长时段具有重大影响的作用机制，但短期内不一定展现明显作用力，下文所有机制均由此宏观框架产生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这一时代划分参考唐世平的界定，主要体现是1648至1945年，也包括史前时代。而杨光斌认为，不能忽视近代资本主义力量塑造世界历史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深层动态性结构，造成了一个颇具进攻性与危险性的帝国主义时代并影响至今。二者对世界历史演进的观察有异曲同工之处，参见杨光斌：《世界政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61页。

②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6-314.

③ 本文对大国的界定参照宋伟的定义，即将大国划分为四类：争霸国、霸权国、潜在争霸国、非霸权国。而同为超大规模的霸权国和争霸国的大国战略竞争关系更具全体系影响力，截至目前只有美苏、中美两大案例。参见宋伟：《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135页。

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何以生成与应对 □

首先,从图1可以看出,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大国关系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导致的大国战略竞争往往引发战争,尤其是霸权国与争霸国的战略竞争关系深刻塑造国际体系的变迁,因为大国战略竞争是推动国际体系演化最重要力量,与一般的竞争或合作存在本质不同。换言之,近代以来,大国基于愈发紧密但失衡的经济—安全联系进行社会动员,塑造针对战略竞争的敌意,通过国内政治机构出台各类对抗政策加剧了战略竞争,在全区域、全体系进行经济、安全(政治)与文化(意识形态)对抗,破坏力极强,往往以体系战争结束阶段性大国战略竞争关系,将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推向顶峰。在世界政治转入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后,对抗烈度有所缓和,因而大国战略竞争是一个保留基本内核又动态演化的概念,当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时,世界需要高度重视对此关系的管理。

其次,图1所展示的是本文对世界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范式内嵌式的理解与运用,宏观理论与完整事实之间总是存在一定差距,在运用时需要一定技巧去融入事实。文章以中美关系过去五十年演进为核心案例进行初步检验,挖掘宏观因果机制,虽然案例时间相对短暂,但中美关系也正是在此前大国关系互动与世界政治长期演化的基础上发展至今。同时,与快照式(snapshot)静态研究取向不同,本文对中美关系的观察采用非线性的动态时间观;^①不排除中美未来在某个时候爆发局部性冲突,甚至关系继续恶化,但按照本文的研究推论,笔者考虑了中美关系之后更为可能的曲线性多维共同演化阶段,这也是现实世界的约束与真正期待。本文试图实现一个整合式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政治经济学,以突破一些知识壁垒,融合有益的跨视野角度。更广义而言,基于大国关系互动具有原子裂变式动能,本文的核心机制可以拓展为大国经济—安全联动错位螺旋失衡——大国战略竞争——国际体系(世界政治)变迁的模式。概言之,本文注重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性演进,以体现对世界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的应用。

再次,唐世平认为,由于现有社会科学研究基础范式的割裂导致人们艰难面对多维演化世界的挑战,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充分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是一个复杂系统,图1展示了在运用国际政治社会演化理论需要尽可能运用社会科学所有的11个基础范式(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个体主义与集体主

^① 本文对时间观的界定更接近于非线性的“道家时间观”,但不是历史循环观。参见赵鼎新:《时间、时间性与智慧:历史社会学的真谛》,载《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期,第3~17页。

□ 当代亚太

义；人性：A. 生物进化 B. 社会化 C. 反社会化；冲突与和谐、系统；社会演化），^① 而本文以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演进作为核心案例进行初步的基础范式综合。一是坚持物质本体优先，但重视越来越显著影响的观念作用，^② 尊重观念作为社会科学三大客体之一的地位。二是赞同个体主义优先，但集体主义在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的演进不可忽视，中美关系互动亦是如此。三是赞同人性中社会化与反社会化并存，当前，国际规范社会化程度极高，但近年来美国霸权护持系列行为就是反社会化的具体体现。四是坚持冲突范式优先，但和谐范式仍然存在于中美关系。五是辩证看待中美关系是运用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系统范式的初步尝试，理解中美互动关系中间接/直接、延时/及时、无意/有意和可观察/不可观察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只关注直接/立即/有意的结果。六是由于生物进化、地理等演化因素在短时间内没有较大改变，不对此加以具体讨论，未来发生显著变动时，需要进一步讨论。社会演化范式涵义也大于生物基因与文化共同演化的涵义，包括更为复杂的事实。

最后，国际政治社会演化范式中最关键的机制是“变异—选择—遗传”，以此可观察大国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错位螺旋的进程及其对国际体系变迁的动态意义（见图1）。譬如，从经济—安全联动开始进入错位螺旋，大国关系互动失衡对应“变异”阶段，进行社会动员，塑造针对战略竞争国的敌意，通过国内政治机构出台的各类政策加剧了战略竞争，对应“选择”阶段，再到错位机制生成与不生成，对应“遗传”阶段，前者主要以大国战略竞争推动国际体系循环演进，进入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后者主要以和平与发展推动国际体系正向演进，进入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

^① Tang Shiping, “Foundational Paradigms of Social Science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43, No. 2, 2011, pp. 211-249.

^② 秦亚青认为，文化作为背景知识对社会事务演变存在潜在、长期甚至重大作用，因而在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文化作为强干预变量的正面与负面作用不可忽视，例如，警惕意识形态的负面作用，强化中美社会人文交流、全球治理规范的正面作用，是中美关系的“防护网”。参见 Qin Yaqing,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35。

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何以生成与应对 □

表 1 时空背景下大国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生成的类型学

经济—安全联动类型		经济—安全错位机制类型	对应大国关系的阶段与案例类型
经济无联系或较少合作	安全无联系或短暂对抗	无错位机制	史前原始国家孤立状态、工业革命前某些区域性帝国分立阶段（例如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负面案例但在时空约束下比较有意义有限）
经济合作	安全无合作	无错位机制	工业革命前某些区域性帝国分立阶段以及早期英美关系（1815~1898），早期美国与欧陆大国关系，如美法关系（1823~1914）（负面案例，有一定比较意义）
经济合作（但存在结构性矛盾）	安全对抗	错位机制随着时间推移正式生成，以世界大战结束阶段性大国关系	如英德关系（1891~1945）日俄关系（1905~1945）（正面案例、具备比较意义）
经济合作	安全合作	权宜且较浅融合的无错位机制	反法西斯同盟内部关系，如美苏关系（1939~1945）（负面案例，具备一定比较意义）
经济合作（但存在准结构性矛盾）	安全合作	错位机制进行到一半中止，返回深度融合	美欧、美日关系（1945年至今）（半负面案例，具备比较意义）
经济完全合作	安全完全合作	深度融合的无错位机制	美英关系（1914至今）（负面案例，具备比较意义）
经济对抗（但转向合作）	安全对抗（但转向合作）	错位机制进行到一半中止，进行权宜合作与浅度融合	如英俄关系（1907~1918）英法关系（1904~1918）（半负面案例，具备一定参考意义）
经济完全对抗	安全完全对抗	完全错位机制	美苏关系（1945~1991）（正面案例，具备比较意义）
经济对抗（但存在结构性相互复合依赖）	安全对抗（但无体系性对抗）	可逆的错位机制，可能通往经济、安全与文化多维共同演化的未来	中美关系（1972年至今及未来）（特殊正面案例，具备高度比较与现实意义）

时空背景下
大国关系经济—安全联动
错位机制生成的类型学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当代亚太

从表 1 可以看出,第一,在历史上,古代部分帝国之间也发生了经济与安全双重对抗的事件(如古希腊时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国混战),^①整体上属于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但由于时空条件的不同,其对抗程度与破坏力有限且在地理上未达到全体系层面。同时,由于政府控制力的问题,经济在大国间安全对抗下也往往存在一定规模的联系;或者纯粹安全对抗,但基本无经济合作,所以并非严格意义上经济—安全联动的错位机制。

第二,中美关系在 1949~1971 年期间不属于错位机制,因为中国处于不稳定的区域大国地位,双边经济关系完全脱钩,仅在意识形态与安全上对抗。

第三,中日关系在 1949 年至今的演变中也出现了经济合作与安全对抗现象,但中日经济脱钩尚未出现,保持相互依赖性,安全对抗程度受内外约束。中日不是霸权国与争霸国的大国关系,并在整体上从属于中美关系,在可见未来内是一个有限度的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

第四,理解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关键在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只有基于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1945 年之后),本文的核心立论才能成立。就方法论而言,本文坚持在时空背景的约束下进行案例选择,不同时代大国关系案例的比较意义存在差异,鉴于学界对二战以前的大国关系案例已有丰富的研究,所以本文重点选择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下更具比较意义的美英、美苏、美日、美欧作为辅助案例(表 1),也间接反驳了“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等似是而非的概念。

第五,尽管下文着重讨论中国在中美大国战略竞争中经济与安全维度的必要应对措施,但如前所述,本文对世界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的运用是基于内嵌式理解,以经济—安全联动为主的分析结合了既有理性主义国际理论的优秀成果,同时在应对措施上增添中美在文化维度的互动,是一个基于国际政治的社会多维演化而推导的必要辅助机制,也试图实现社会科学中基础

^① 在不加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本文对安全与政治这两个术语定义存在高度重叠,安全合作是政治互信的最高体现,政治收益是安全竞争的主要目的。安全竞争或合作必须服务于政治目的,否则将扭曲整体国家利益,常常导致大国崛起失败;而政治目的收益往往离不开安全竞争的支撑,因为“枪杆子里出政权,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中外历史上,孙子、吴起、范蠡、孙臆、考底利耶、马基雅维利、黎塞留、克劳塞维茨、俾斯麦等人均对此有过著述。

范式的综合。全文理论运用、论证分析与政策建议并不矛盾，文化维度对缓解大国战略竞争紧张程度非常有必要，这也是中美关系很大程度区别于美苏冷战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大国关系案例的特殊性所在。

三、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核心动力： 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演变历程及启示

中美关系在过去五十年的演进上存在经济与安全两大支柱，但经济与安全呈现错位式发展，前者的压舱石作用正在遭到美国动摇，后者除了冷战期间对抗苏联的战略合作与临时性非传统安全合作之外，在当下尤为脆弱与敏感。整体而言，中美经济—安全联动错位的螺旋失衡导致了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生成，具备特殊性与普遍性，历史进程表明，中美两国需要审慎、负责任地管理大国战略竞争关系。

（一）安全合作为主导，推动经济合作的良性联动时期（1972~1989）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直接动力是两国针对苏联体系压力形成的安全准联盟关系，在亚太地区形成中美苏战略稳定大三角。^① 历经尼克松—福特与卡特政府的短暂波动，美国政府继续将苏联作为安全战略的主要对手，以“里根主义”积极倡导与苏联展开大国战略竞争，加快中美安全合作。面对一直困扰中美关系大局的台湾问题，美国多次主动澄清美台关系的非官方性质，并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做出非实质性让步。^② 中国方面也做出适当调整，双方在共同安全利益考量下维持既有中美苏的大国战略稳定。^③ 1982年中美发布《八一七公报》之后，美国宣布不追求“两个中国政策与长期对台军售计划”，^④ 强调中美共同维护世界和亚太和平，反对侵略扩张，表明这一时期两

① William Thompson, Kentaro Sakuwa and Prashant Suhas: “Strategic Rivalrie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Antagonisms”, in *Analyzing Strategic Rivalries in World Politics, Evidence-Based Approaches to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Volume 4), Singapore: Springer, 2022, pp. 23-32.

②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p. 109.

③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Reflections on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Toronto: Penguin Press, 2014, pp. 135-222.

④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 当代亚太

国安全关系大致稳定。在政治互信基础建立后，安全关系对经济关系的合作产生显著联动效应。1972年2月，两国领导人历史性会晤推动了双边经贸关系正常化，1979年1月，邓小平领导代表团在访美期间与美国政府广泛磋商，^①“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囊括农业、环境、科学等社会文化方面”。^②邓小平在战略层面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做出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判断，^③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原则下加快吸收先进技术以推动国内生产力发展。^④中美正式建交后，美国国会于1980年批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双方经济关系密切发展也使两国社会以空前效率加速融合，双向受益。^⑤基于两国战略共识，同年“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Sino-US Joint Economic 1980 Committee)也正式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成为协调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框架”。^⑥综上，由于双边具有重大共同安全利益，中国经济增长尚未触发美国战略界的警惕，中美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加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尚未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产生巨大的分化作用，第三方因素也没有干扰中美关系的稳定大局；美国没有发起社会动员，没有针对中国塑造战略竞争国的敌意，并努力避免国内政治机构对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阻碍，双方均在此过程中同时满足战略、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较高程度的政治互信，^⑦出现罕见的经济—安全联动蜜月期。

(二) 经济合作为主导，调节安全冲突的良性联动期 (1993~2008)

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的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保持稳定的压舱石作用明

^① Richard Solomon, “U. S.-PRC Negotiations, 1967-1984: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report of RAND to State Department, December 9, 1985, p. 86; “Meeting with Deng Xiaoping”,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 CH00587, June 16, 1981, p. 3.

^②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54页。

^③ 时殷弘：《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探索过程中的国家对外战略》，载《美国研究》2018年第3期，第9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6页。

^⑤ Joyce K. Kallgren and Denis Fred Simon, *Educational Exchanges, Essays on the Sino-American Experience*, Berkeley,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 pp. 132~140.

^⑥ 杨洁勉：《中美外交互动模式的演变：经验、教训和前景》，载《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第12页。

^⑦ 如这一时期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的松动与安全合作，参见黄琪轩：《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3期，第106页。

显上升。随着苏联解体，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体系压力消失，双方安全矛盾再度出现，加上中国国内改革遭遇瓶颈期，美国国内对华经济完全脱钩加战略封锁的声音甚嚣尘上。以两国在中国主权问题上的管理为例，美国试图在1995~1996年台海危机上挑战中国主权底线，但在中国充分显示维护主权的战略决心后，美国迅速放弃试探，^① 并提出具有强烈经济合作导向的对华政策三原则：一是维持中国的安定和开放，二是支持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三是寻求对华对话和接触。^②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随后实现互访，也一致表示两国合作的基础得到加强，以《中美联合宣言》作为面向21世纪建设战略伙伴关系的起点，美国也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末对华政策大讨论的结论，即继续以接触政策为主，维持亚太地区秩序的中美协调。^③ 克林顿政府也表态，“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的“三不”承诺，^④ 中美安全关系在这一阶段始终保持了战略克制与畅通机制的沟通。^⑤ 而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发生2001年4月的南海撞机事件，虽然事件处理结果是美方进行道歉，中国归还美军迫降在海南的飞机，但两国敌对意向在没有突破经济关系底线的情况下明显上升，^⑥ 中美安全关系陷入冷战后低谷。然而随着“9·11”事件的爆发，作为一个偶发因素推动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上实现良好的临时性非传统安全合作。随着中国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对两国关系的调节作用加速凸显，两国成功共管“台独”阴谋，安全关系的稳定也为中美两国经济关系持续深入联系提供了较为温和的政治环境。^⑦ 尤

① 沃伦·克里斯托弗：《美国新外交：经济、防务、民主》，苏广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② 辛华主编：《构筑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美首脑互访纪实》，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③ Susan Shirk, "Asia-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Balance of Power or Concert of Powers?", In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organ eds.,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3-45.

④ 《克林顿政府承诺“三不”政策》，人民网，1998年7月1日，<http://www.people.com.cn/9807/01/current/newfiles/a1060.html>。

⑤ Peter Rodman, *Presidential Command: Power, Leadership, and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from Richard Nixon to George W. Bush*, New York: Knopf, 2009, pp. 82-285.

⑥ 陶文钊等：《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200页。

⑦ 美国认为中美可以相互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参见 Robert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NBR Analysis*, Vol. 16, No. 4, 2005, p. 5.

□ 当代亚太

其是在美国“参议院的法案稍微缓和，并赋予总统更大的自由权，总统可以根据自己对于国家利益的评估决定取消制裁”这一措施出台后。^①在此基础上，两国经济与安全合作得以进一步深化，并借助信息技术革命，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推上史无前例的广度与深度，美国在此过程中的相对收益极高，维持了单极时刻的体系霸权，中国自身也获得融入世界经济、谋求自身发展的较大相对收益。^②总之，由于中国经济崛起尚未触发美国战略界的完全警惕，中美经济结构进一步高度互补，临时性非传统安全合作顺畅，加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产生巨大的分化作用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第三方因素在整体上还没有干扰到中美关系的稳定大局，美国依然没有发起社会动员，没有针对中国塑造战略竞争的敌意；并大致上避免了新保守主义等政治势力通过国内政治机构阻碍双边关系正常发展，双方均在此阶段继续同时满足战略、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较高程度的政治互信，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尚未正式生成，维持良性联动，避免了两国战略竞争关系的提前到来。^③

(三) 经济调节作用下降、安全矛盾上升与大国战略竞争初步生成期 (2009~2016)

在这一阶段，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虽逐渐凸显，但仍保持大致稳定，但安全关系矛盾再度显著，^④经济—安全联动开始走向失衡。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中美两国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这一非传统安全，利用二十国集团等新兴多边组织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然而到第二任期，奥巴马政府高度重视中美经济与安全竞争问题，加快用更为直接的方式介入亚太战略博弈，引发部分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担忧。^⑤在经济上，奥巴马政府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核心部分，推动经济

① 陶文钊等：《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111~132页。

② Vinod K. Aggarwal and Kristi Govella, *Linking Trade and Security: Evolving Institutions and Strategies in Asi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rlin: Springer, 2013, pp. 1-73.

③ John Y. Schrader and Roger Allen Brown,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01: Lessons on Managing Change i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documented_briefings/2005/DB379.pdf.

④ Lieberthal Kenneth,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Goes Global”, *Current History*, Vol. 108, No. 719, 2009, pp. 43-49.

⑤ 主要代表是基辛格博士等人，参见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Toronto: Penguin Press, 2015, pp. 335-422.

高标准、政治排他性的 TPP 谈判，并在其任内成功签署。这些经济准脱钩行为给中美合作造成不稳定，经济议题安全化趋势明显，并被随后的特朗普政府无限放大。在安全上，基于中国 2010 年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美国在 2014 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宣称到 2020 年前，把百分之六十的海空兵力部署在亚太以威慑中国。^① 其战略界也在 2015 年前后再度发起对华战略大讨论，认为美国不能坐视中国崛起取代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必须在安全上予以遏制。^② 对美国而言，安全遏制与威慑见效很快，在中国发展完备区域拒止与反介入能力（A2/AD）的“客观挑战”之前，必须确保美国在亚太安全轴辐体系内的领导力。总之，奥巴马政府对此进行经济与安全四个层面的霸权护持：一是在其 8 年任期内，亚太再平衡军事威慑顺利完成，多国联合军演频频举行，并扩充新军事基地。二是在南海问题、东海问题、朝核危机等热点上挑动局势，具有强势的政策工具。^③ 三是在亚太的外交联盟也成功建立，奥巴马自称是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④ 并在 2009 年至 2016 年 11 月期间共访问亚洲 11 次。除重视和升级传统盟友关系（2014 年 4 月美菲签署为期十年《强化防务合作协议》）之外，美国加大对东南亚、南亚各国的联系与投入。2009 年，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传统敌对国家越南、老挝，甚至缅甸进行非盟友伙伴国合作，^⑤ 双边关系得到实质性提升。2010 年至 2014 年，美国与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建立合作伙伴关系，2015 年将美印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⑥ 四是在经济上更加倚重亚太盟友和新兴市场，也是美国亚太战略中对中国进行安全施压的间接体现。以上综合措施的出台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发生巨变。总之，由于中国

① 吴心伯：《亚太大棋局：急剧变化的亚太与我国的亚太方略》，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0~65 页。

② 凌胜利：《双重困境与动态平衡：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与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3 期，第 70~83 页。

③ Michael J.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518-538.

④ “Fact Sheet: Advancing the Rebalance to Asia and the Pacific”,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11/16/fact-sheet-advancing-rebalance-asia-and-pacific>.

⑤ 王伟男：《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路径及其制约性因素》，载《教学与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36 页。

⑥ 有关战略规划文件参见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10/>；<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15/>。

□ 当代亚太

经济崛起已经引起美国战略界的完全警惕，中美经济结构进一步高度互补的同时，出现价值链地位攀升的矛盾，加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产生巨大分化作用的加速凸显，第三方因素出现集体性干扰中美安全合作与整体大局。美国开始围绕中国发起社会动员，针对中国塑造战略竞争国的敌意，并放任国内政治机构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双方在此过程中不再同时满足战略、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较高程度的政治互信，经济—安全联动关系错位机制初步形成，导致初步生成大国战略竞争关系。

(四) “经济—安全”联动关系错位机制正式生成与大国战略竞争期(2017年至今)

如前所述，2015年前后，在美国相对衰落、“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① 美国战略界再次掀起对华政策大辩论。^② 接触派、遏制派与顺应合作派对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接触政策以及中美竞合平衡关系能否持续，进行反思与评估。^③ 结果是大部分精英认为，中国政治与经济体制并没有按照美国构想的方式演变，^④ 由此认为接触政策失败。^⑤ 美国战略界“幻灭与失望情绪强烈，要求示强的声音十分强烈”，^⑥ 对华强硬成为主流声音，“温和派的主张处于守势和劣势”，^⑦ 敢于客观认知中美关系的学者相对偏少。^⑧ 顺应这一大辩论背景，特朗普政府认为，中美关系正在步入大国战略竞争时代，^⑨ 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正在遭遇崛起国“威胁”。而特朗普政府上

① 韩召颖：《秩序合法性视角下的中美战略竞争走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24页。

② 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期，第19~28页。

③ 参见“U. S. -China 2018 Year in Review: A New Cold War?”，<https://www.wilsoncenter.org/event/us-china-2018-year-review-new-cold-war>。

④ Kurt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8-02-13/china-reckoning>。

⑤ 参见“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Releases/Release/Article/2193725/united-state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⑥ 罗振兴：《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载《美国研究》2019年第5期，第93页。

⑦ 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真的形成共识了吗？——基于当前对华政策辩论的分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3期，第21页。

⑧ 傅高义、董云裳等人认为中国并非美国敌人，参见 Ezra Vogel and Susan Thornton, “China is not an Enemy”,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3, 2019。

⑨ 王浩：《联盟重组与美国对华战略演进的国内政治逻辑（1978~2018）》，载《美国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第51页。

台初期中美建立的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在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都陷入停摆状态，美方整体上进行更为激进的霸权护持，虽然现任拜登政府修正了特朗普政府部分背离自由国际主义的措施，但对华大国战略竞争的烈度依然不减。

在安全上，2017 年 12 月以来，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国防战略报告》(2018)、《核态势评估报告》(2018) 与《印太战略报告》(2019) 和国情咨文等多个关键文件中，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锁定“中国是美国逆全球化、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策的主要目标”。^①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国会围绕涉华议案的投票情况，也支持了两党自 2015 年对华战略大讨论形成的共识，进一步加大了干涉中国内政的力度。2017 年 12 月 18 日，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最强战略竞争对手，^② 是冷战结束以来对国际地位的最严厉定性。2019 年至今，美国多次破纪录批准对台军售，鼓励“台独”“港独”等势力联动，干涉新疆问题，使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经济竞争更为显性，其对华政策重新回归冷战初期的战略遏制与经济民族主义。尽管亚太地区冷和平状态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但局部军事冲突和恶性竞争的可能性在逐渐加大，因为无论是基于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相互依存派”，还是始终在战略上对中国充满敌意的“霸权护持派”，都不愿把美国全球霸权利益让渡给任何国家。^③ 而新冠肺炎疫情 (COVID-19) 这一非传统安全冲击也没有让中美两国实现深度合作，也未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两国的矛盾，反而成为美国对中国污名化的工具，加剧了两国社会间的对立。

在经济上，基于中美政治互信下降与长期安全竞争叙事建构的挑动，^④

① 张建新：《想象与现实：特朗普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载《国际政治研究》2018 年第 5 期，第 94 页。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③ Chas Freeman, Jr., “The Mess in U. S-China Relations”, <https://chasfreeman.net/the-mess-in-u-s-chinarelations/>; Jeffrey Bader, “U. S-China Relations: Is It Time to End the Engagement?”,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8/09/FP_20180925_us_china_relations.pdf。

④ John Ravenhill, “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6, No. 1, 2013, pp. 1-15.

□ 当代亚太

特朗普作为一个富豪型民粹主义、非建制派总统，在两国经济关系上坚持脱钩论。虽然“全经济、全金融脱钩亦是美国不情愿看到的前景，而且并不具备全面脱钩甚至重回冷战时期两个平行世界的基础和条件”，^①但美国单方面界定“两国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全球经济失衡的总体格局难以为继”，^②需要加以改变。2017年8月，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并在同年10月宣布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2018年3月22日，美国正式发起全方位制衡中国的贸易战，以国内法为依据，对华进口商品征收数轮高额关税，极力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业，战略性压制《中国制造2025》所规定的十大高科技产业，把关税问题扩大到科技、金融、汇率与知识产权等领域。这一系列举措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摆脱依附式倾向触动了美国“作为现有国际分工主导者的既得利益”，^③凸显其相对衰落。当前，拜登政府也基本延续对华经济与安全打压战略，在价值观、价值链、供应链与安全上更具进攻性与危险性。^④此前双方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导致中美国（Chimerica）的形成，^⑤目前被美国“采取政治手段、借助盟国的市场体系对中国的企业和市场制度施加压力”，^⑥进行强行脱钩，互补结构正被美国进行意识形态化与战略竞争化。尽管两国实力差距仍然较大，但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安全主导地位夸大认知，阻碍了中美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⑦综上，美国战略界已经充分动员，单方面否认中美经济结构的高度互补性，夸大中国经济在价

① 付宇：《对当前中美“脱钩论”的观察与思考》，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7期，第33页。

② 王达：《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意义、内涵与挑战》，载《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4期，第34页。

③ 李滨：《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中美贸易冲突根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3期，第21页。

④ 参见“Joint Leaders Statement on AUKUS”，<https://www.whitehouse.gov/?s=AUKUS>，<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9/u-s-eu-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inaugural-joint-statement/>；“Joint Statement from Quad Leaders”，<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joint-statement-from-quad-leaders/>。

⑤ Niall Ferguson, “Team ‘Chimerica’”, *The Washington Post*, Nov. 17, 2008; 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8.

⑥ 王玉柱：《发展阶段、技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格局调整——兼论大国政治驱动的新区域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144页。

⑦ Liu Feng and Liu Ruona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Order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An Economy-Security Nexus Approach”,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6, 2019, pp. 972-995.

价值链地位攀升的矛盾，加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产生巨大分化作用的完全凸显，第三方因素加剧集体性干扰中美关系的稳定大局，美国系统性发起社会动员，针对中国进一步塑造战略竞争国的敌意，并进一步放任国内政治机构对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阻碍，双方均在此过程中不满足战略、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政治互信，因此，两国经济—安全联动关系失衡的错位螺旋机制，推动了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正式生成。

(五) 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

上文以中美经济—安全关系联动为核心案例进行过程追踪，可以发掘双边关系演进中的因素与机制，二者共同作用导致了中美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生成。同时借助宋伟界定的联盟关系中“战略利益、实力关系与国内秩序兼容度”三组变量进行广义性考察，^①发现当前中美安全关系在这三个变量上均发生重大改变，导致了中美冷战期间安全上“准联盟关系”的解体。^②尤其是近年来，中美共同战略利益相对缺失、经济实力对比改变，对中国国内政治秩序的不满让美国感受到霸权护持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中美经济长期性的“准联盟关系”也面临巨大挑战。表2展现了过去五十年中美经济—安全关系联动的五种理想类型，图3展现了驱动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经济—安全关系联动错位机制。

表2 中美经济—安全关系联动理想类型（1972年至今）

经济—安全关系联动模式	政策类型	对应时间
安全合作为主导，经济合作辅助	接触加防范	1972~1989
经济与安全均合作	理想状态 (短暂出现)	1993~2008
经济合作为主导	接触加遏制	2009~2016
经济与安全错位	关键领域 脱钩加遏制	2017年至今
经济与安全均深度合作	理想状态 (尚未出现)	经济、安全和文化多维共同演化的可能未来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宋伟：《联盟的维持与瓦解：理论分析与案例检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3页。

^② 关于准联盟理论研究参见孙德刚：《联而不盟：国际安全合作中的准联盟理论》，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6期，第59~67页；孙德刚：《结盟外交与国际安全竞争中的“三层博弈模式”》，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6期，第41页；孙德刚：《论“准联盟”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第55~73页。

□ 当代亚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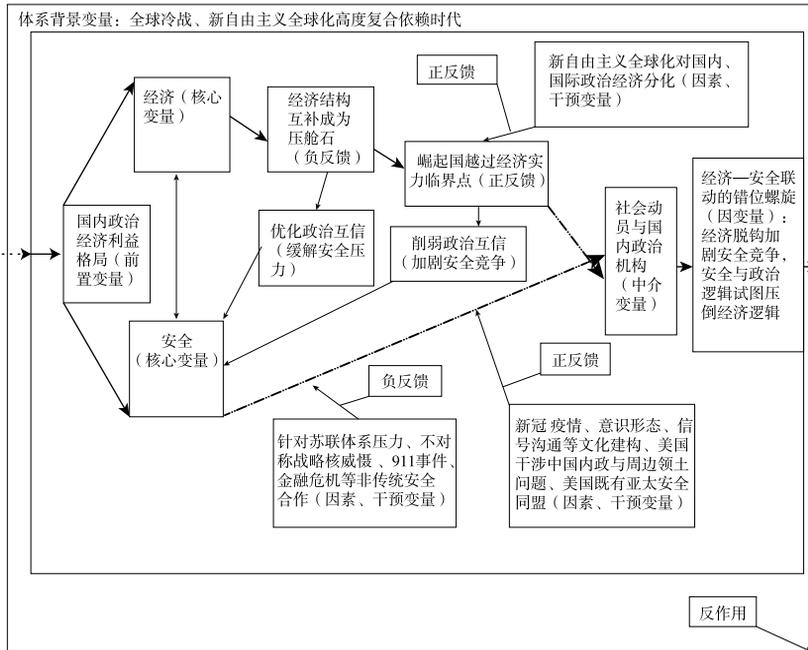


图2 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

说明：线条粗细表示机制与因素作用力的强弱，虚线表示虽然目前中美经济与安全关系联动的错位机制已经生成，但是可逆的，在强度上不如美苏等大国战略竞争激烈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2更为清晰地展现了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经济—安全联动关系错位机制，区分了若干因素与核心机制作用的关系。在这一机制的驱动过程中，物质力量对比变化具有本体论优先的动力，而意识形态等价值观念动力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剧变大，并且在过去五十年双边关系互动中，美国扮演主要施动者角色。两国以全球冷战体系压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高度复合依赖时代为背景变量，国内政治经济利益格局作为前置变量，^①都对双方经济与安全产生合作需求，形成经济与安全两大核心变量。在经济关系演进的逻辑上，美国将中国纳入其主导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国实现美国

^① 对于大国而言，国际秩序始于国内，对外政策基于国内利益需求，更多表现为塑造国际体系的自变量。参见黄琪轩：《国际秩序始于国内—领导国的国内经济秩序调整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载《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4期，第1~30页。

体系下的经济崛起。在此前的经济关系演进中，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作为负反馈数次化解了中美在意识形态与安全领域的局部冲突，但目前中国被美国单方面认定为“威胁”其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经济关系从“压舱石”变成“导火索”，从而强化两国安全竞争。在安全关系演进的逻辑上，中美在深度战略互信上始终存疑，但不妨碍两国以面对苏联的体系压力为初始起点，临时性的非传统安全等因素作为负反馈缓和两国整体安全关系，并以不对称核威慑保障双方无大规模直接军事冲突的战略底线。但在美国持续干涉中国内政与周边领土争端问题、美国既有亚太同盟体系针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压力，以及美国针对中国越来越凸出的意识形态敌对等因素的正反馈下，美国刻意强调中国带来的体系压力，认定中国军事实力基于积极防御型战略的相对提升是“修正主义”，加速经济部分领域的脱钩。新冠肺炎疫情原本可以作为临时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因素缓和两国关系，但事实恰恰相反，美国通过社会动员与国内政治机构的（由于美国是之前中美关系中权势主导方，社会动员与国内政治机构主要是指美国）中介变量，从而在特朗普政府以来正式驱动经济—安全联动关系的错位机制。即经济发展引发安全竞争，政治与安全逻辑又试图压倒经济的螺旋失衡，导致两国进入中长期的大国战略竞争阶段，已完整经历战略竞争舆论导向、战略竞争决策与战略竞争实践的过程闭环。^①

需要指出的是，中美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普遍存在于大国关系，但特殊性在于，随着高度全球化带来的复杂系统效应，中美面临与美苏冷战时期不同的体系压力环境，中国具有非零和战略思维的传统，也拥有欧洲与日本不完全具备的战略创新、战略威慑与战略自主力；^② 美国进行经济完全脱钩与安全战略竞争的成本—收益将会失衡，加上中美此前经历过长阶段的合作关系，意味着这一错位机制的可逆转性可能更高，当前阶段的战略竞争更有可能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多维演进做基础。

^① 刘胜湘、陈飞羽：《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论析——兼论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比较》，载《当代亚太》2021年第5期，第19页。

^② 中国政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选择、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与战略自主规划能力上均具有比较优势，在疫情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优势将进一步放大，从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8年12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2/18/c_1123871854.htm。

□ 当代亚太

（六）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历史启示

启示 1：当中美经济关系处于良性互补时，经济关系有利于安全关系的缓和

如前所述，由于经济紧密互补联系，中美双方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成功克服第三次台海危机、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问题和南海撞机事件等，并在多个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促进双边关系的共赢。尤其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中美安全关系合作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中美共同克服金融危机，证明了两国间经济—安全的良性联动。即便在现任的拜登政府，中美经济关系仍然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中国已经宣布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与推动国内国外双循环的决心，相关体制改革使对外合作的平台更为宽阔，^① 美国政府可在摒除意识形态偏见与经济问题泛安全化的前提下，与中国进行新阶段的互补性竞合关系，从而缓解双边关系的持续性紧张。

启示 2：当中美经济关系存在地位攀升的矛盾时，经济关系矛盾强化安全关系竞争

中美在经济上供应链、产业链与价值链地位的客观矛盾，是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与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根本推动力。近年来，“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美国经济收益衡量方式由注重绝对收益转为注重相对收益”加剧了中美安全竞争，^② 加上美国政治经济精英对华的主观偏见认知、军工复合体等保守利益集团的政策诉求及其国内政治经济极化的困境，共同推动了美国对华安全政策从防范转向遏制，这需要中美在下一阶段的经济竞合关系的管理上特别重视。

启示 3：当中美“经济—安全”联动关系进入错位机制时，第三方因素作为干预变量会放大双边关系的错位

自 2012 年以来，面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崛起的压力，美国加剧了在台湾（地区）、钓鱼岛、南海问题（2016 年南海非法仲裁案）方面针对中国的博弈，这些中国周边领土争端问题的集中性爆发，既不是中国主动发起的修正主

^① 《习近平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新华网，2021 年 11 月 4 日，<https://www.ciie.org/zbh/cn/19news/leader/xnews/20211104/30426.html>。

^② 陈定定：《“压舱石”到“导火索”：中美经贸关系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 年第 4 期，第 55 页。

义行为，也主要不是由本地区国家主动挑动的，其背后都有美国利用主权问题以迟缓中国崛起的战略目的，这些都加剧了中美双边关系的错位失衡。美国习惯性利用西藏、新疆和香港等问题对中国政府进行污名化，以社会动员挑动对中国的敌意，通过国内政治机构出台各类政策试图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尤其是自 2019 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在疫情溯源与抗疫成果上对中国进行进攻性更强的污名化，以达到国内多重治理问题归因外部之目的，从而加剧了两国社会情绪的对立。^① 此外，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印度、欧洲等重要第三方行为体会对中美双边关系与中国外部战略环境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② 对此，中国需要审慎对待周边外交压力，美国需要稳定的联盟管理，以防止中美经济—安全联动错位关系进一步失衡。

启示 4：当前中美“经济—安全”关系错位机制可以逆转，但过程漫长，正确引导信号沟通等非物质力量可以较大程度缓解错位困境

无论在经济还是安全上，美国与中国的全面对抗难以独自支撑，也得不到如冷战时期盟友的强力支持，对华共识在力度与持续度上可能均不及针对苏联的冷战共识。^③ 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大悖论是在国内政治经济联盟对等极化的背景下，其“中下阶层的民众之所以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重要原因是其工作被转移了，而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正是美国跨国公司”。^④ 这些基本事实表明，当“中美战略竞争进入多议题联动和多平台爆发时，如何管控战略竞争与传递中国战略决心面临新的挑战”，^⑤ 由此，在拜登政府的中美关系互动中，“改进理性主义和错误知觉理论关于私有信息引发冲突的逻辑”十分必要。^⑥ 例如，2021 年 9 月 25 日孟晚舟女士顺利回国、2021 年 10

① “Most Americans Have Cold Views of China”,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1/06/30/most-americans-have-cold-views-of-china-heres-what-they-think-about-china-in-their-own-words/>.

② 曹玮：《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战略第三方选择：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欧 VAR 模型分析》，载《当代亚太》2021 年第 5 期，第 74 页。

③ 刁大明：《美国对华战略的“全政府”方式：概念、逻辑与现实》，载《当代美国评论》2021 年第 2 期，第 21~41 页。

④ 钟飞腾：《超越霸权之争：中美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载《外交评论》2018 年第 6 期，第 21 页。

⑤ 尹继武：《中国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战略决心信号表达》，载《外交评论》2020 年第 5 期，第 23 页。

⑥ 尹继武：《私有信息、外交沟通与中美危机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8 期，第 71 页。

□ 当代亚太

月以来中美高层恢复部分领域对话，这些都展示了中美关系可能阶段性缓和的信号。同时，中国可以借鉴冷战结束初期针对克林顿政府“释疑外交”的有益经验，^① 坚持只有在主权等底线问题上的信号充分传递，才会让美国真正尊重中国核心利益的原则，“尤其是在战略冲突和威慑领域，国家需要向对方传递准确的信号以形成可信的战略承诺”。^② 这也需要中国推行积极防御战略的同时，始终保持战略耐心，对美进行有效的战略互信信号的沟通，并进一步提高战略威慑的可信度才能实现。

启示 5：两国战略互信可以缓和双边关系的矛盾，取决于两国政治力量的引导

中美关系的演进历程表明，应充分认识到领导人外交对双边关系定位的重要性，两国政治力量的正向引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双边关系的误解与矛盾。两国时任领导人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积极互动推动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习近平主席与时任奥巴马总统非正式会晤推动了两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2021年11月16日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提出了新时期中美关系“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的三大原则，^③ 这些都在各个时期引导中美关系稳定与发展的大局。^④

四、应对中美大国战略竞争： 历史启示与迈向经济、安全与文化的多维共同演化

（一）大国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比较案例启示

尽管时空背景等变量存在不同，但从方法论来看，美英、美苏、美欧、

① 释疑国通过言行一致、不可逆转甚至公开可见的行为方式，做有说服力的合作承诺，以打消对象国的疑虑，从而有效避免对象国决策者的认知偏差，并在此基础上动员足够多的对象国国内政治力量的支持，进而说服决策者执行合作。参见刘舒天：《战略释疑与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转向》，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第120~125页。

② 左希迎：《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型》，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4期，第10页。

③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中国政府网，2021年11月16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11/16/content_5651232.htm。

④ 此观点特别感谢吴心伯教授、沈逸教授的有益启发。

美日四组大国关系的互动进程^①在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的初始条件类似（核武器的安全革命、全球经济联系程度高、国际规范高度演进等），内在因果机制相似，但由于诸因素作为干预变量的正负反馈的驱动力不同，可以构成正面、负面与半负面案例。尤其是机制过程进行到一半的“半负面”案例，可以“清晰地展现因素、机制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更有力地论证机制的作用”。^② 本节基于上文的大国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生成的宏观框架与类型学，通过对上述四组大国关系的考察，证明了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广泛存在，结合中美关系的演进与吸取这些案例的历史启示，有利于为应对中美大国战略竞争提供对策性思考。

1. 美英关系（1914 年至今）

两国作为大国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关系错位机制生成的负面案例，并没有经历实质性长期的战略竞争与经济脱钩。美国独立后，两国从此前短期的对立竞争关系中和解，逐渐转变成稳固的联盟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基于优越的地理禀赋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享受罕见的体系庇护优势，^③即挑战英国霸权的其他崛起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掩盖了美英作为崛起国（潜在霸权国、争霸国）与守成国（霸权国）的矛盾。^④ 在时空条件发生巨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形成特殊关系，“衰弱的英国和兴起的美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加强双边合作，则是美英特殊关系得以形成的客观条件”。^⑤ 整体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式确立特殊盟友关系后，双方战略利益契合度、实力关系对比与国内秩序兼容度高度一致，经过大致三个阶段的起伏，一是深度合作期：从二战期间丘吉尔政府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二是后殖民时代短暂矛盾期：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末期；三是再调整的高度弥合期：从撒切尔夫人时期至今。英美关系在面对其

① 需要强调的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也处在不断演进中。例如，2021 年 9 月 15 日，美英澳成立三边安全机制（AUKUS），对美日、美法同盟造成冲击，至于这些大国关系的互动如何进一步演变，基于文章篇幅所限，需另文研究。

② 周亦奇、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12 期，第 32 页。

③ 高程、王震：《大国崛起模式与中国的策略选：基于大国崛起历史进程的比较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12 期，第 23 页。

④ 宋伟：《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71~230 页。

⑤ 程宏亮：《美英特殊关系的形成条件分析及对两国的影响》，载《理论界》2009 年第 4 期，第 202 页。

□ 当代亚太

他崛起国体系压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共同利益等多个领域出现负反馈，既有联盟体系、非传统安全合作与深度身份认同等第三方因素的巨大合作利益，导致两国安全完全合作，错位机制始终没有正式生成，从而维持了两国经济—安全良性联动并且持续至今，一定程度推进了国际体系的正向演进（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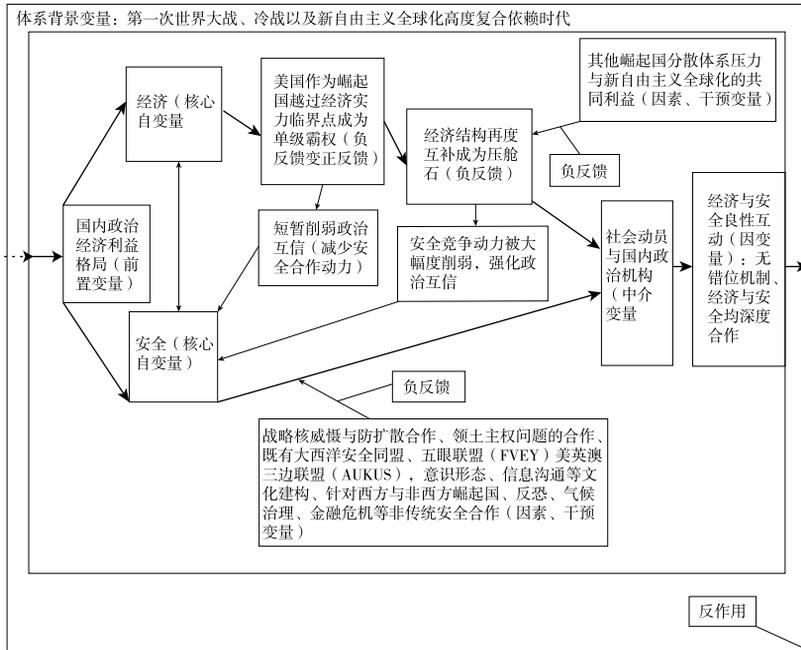


图3 美英经济与安全关系良性联动的动力机制 (1914年至今)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2. 美苏关系 (1945~1991)

在借鉴学界丰富的美苏冷战研究基础上，本文认为，美苏关系是经济—安全联动完全错位机制生成的正面案例，也造成了国际体系长达数十年的紧张。1946年，乔治·凯南 (George Kennan) 认为，美苏关系决裂可行性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两国“利害关系微乎其微”，^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国联盟关系中的战略利益、实力关系与国内秩序兼容度均发生巨大转变，经济合作被

^① George Kennan, “The Long Telegram”, <http://www.ntanet.net/KENNAN.html>.

安全化，始终无法深度推行。^① 尽管经济关系是美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两国在政治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出现全球性对立，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往往受到政治（安全）关系的制约，^② 经济领域的完全脱钩加剧安全竞争是美苏冷战主要驱动力，^③ 美国与苏联经济关系在冷战初期、缓和时期与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均充斥制裁、遏制与封锁。^④ 冷战史研究表明，“美苏双方的经济始终得不到正常发展，对外贸易往往成为双方斗争的一种武器而不是促进双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手段”，^⑤ 长期保持经济遏制与政治施压挂钩。^⑥ 此外，苏联一度繁荣的经济发展也始终遭到美国在安全上的警惕与制衡，这也是美苏关系乃至当下美俄关系始终无法得到真正和解的根本原因之一。^⑦ 总之，在美苏经济—安全联动失衡的关系上，双方在经济发展、两大阵营对抗等多个领域实现了正反馈，始终保持高度战略互疑。意识形态敌对等因素作为强干预变量恶化了双边关系，核安全与少量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因素对缓和双边关系的效用有限，并通过充分社会动员，塑造双边战略竞争的敌意，通过双方国内政治机构出台各类战略对抗政策，进行军备竞赛，在全球范围内全体体系对抗。两国经济—安全关系联动的错位机制导致了冷战的兴起与美苏大国战略竞争的持久进行，最终以苏联解体和平结束阶段性大国关系，作为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第一个大国关系的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案例，推动了国际体系正向演进（见图4）。

① Michael Mastanduno, “Trade as a Strategic Weapon: American and Alliance Export Control Policy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Issue 1, 1988, p. 125.

② 崔海智：《战后苏美经济合作尝试的失败——兼论经济冷战的起源》，载《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第28页。

③ 沈志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载《当代中国与世界》2021年第1期，第107页。

④ Richard N. Cooper,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Cold War, 1962-1975”,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II)*, *Crises and Déten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4.

⑤ 白建才：《卡特时期美苏经济关系探析》，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126页。

⑥ David W. Hunter, *Western Trade Pressure on the Soviet Union: An Interdependence Perspective on Sanctions*, London: Macmillan Palgrave, 1991, pp. 26-30.

⑦ 唐世平：《和解与无政府状态的再造》，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1期，第61~104页。

□ 当代亚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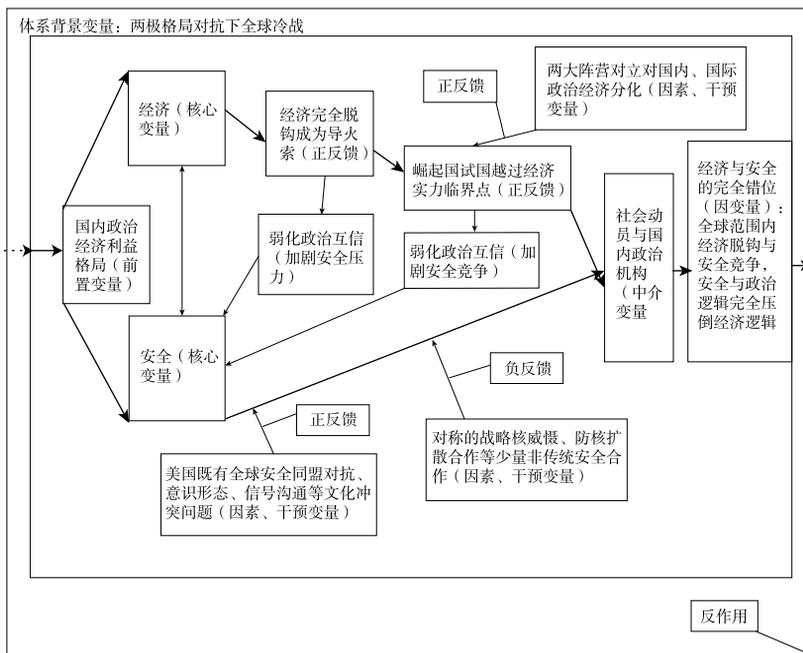


图4 美苏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经济—安全联动完全错位机制（1945~1991）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3. 美欧与美日关系（1945年至今）

美欧关系与美日大国关系是经济—安全关系联动错位机制生成的半负面案例，即这两组关系出现过经济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可能，但这一过程后来被互动双方中止。冷战初期，西欧战后复兴的经济和安全需求与美国经济扩张、制衡苏联的战略需求合流，以1949年北约组织成立为标志，美国和西欧正式结成大西洋联盟（Atlantic alliance），同时期建立亚太双边同盟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欧、美日关系的总体局面由此奠定。整体而言，美欧关系、美日关系在双方战略利益契合度、实力关系对比与国内秩序兼容度高度一致，大国关系稳固历经数次短暂波动但持续至今。美国作为域外国家，享有对欧洲和日本的安全霸权，但并不完全拥有经济上的霸权，由于美国和日本、欧洲的经济体系相对独立，不存在垂直的分工安排，甚至还存在激烈的贸易竞争。^①但“对

^① 肖河、潘蓉：《大国竞争视角下的日美贸易冲对“广场协议叙事”的再审视》，载《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第98~115页。

于中小规模经济体而言，即便在相关领域拥有较强的技术竞争力，但因其经济体量的局限仍只能成为大国主导的产业体系中的一环，而难以对大国构成经济或政治层面的安全冲击”。^① 例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利用自身在国际体系的超强实力与对日本政局的特殊影响，以转移国内经济矛盾为主导动机，针对日本设计了《广场协定》，^② 两国签订协议后“仅仅几年，地位和命运就发生了重大转折”，^③ 加上双方在意识形态与安全等战略利益上高度契合，极大地缓解了经济矛盾，寻求新的经济合作空间。总之，美日经济“紧张与缓和既对安全关系构成重大影响，又受制于安全关系的大框架”。^④ 由于“强化美安全同盟是抑制经济摩擦的有效手段之一”，^⑤ 双边经济摩擦始终存在限度，度过冷战结束对两国联盟关系的挑战，^⑥ 并且有了建构主义所言的共同身份认同，^⑦ 这一类似的进程也发生在冷战后的美欧关系上，维护了双边经济—安全良性互动关系的韧性。^⑧ 综上，在美欧、美日经济—安全联动关系上，双方在面对崛起国体系压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共同利益等多个领域出现负反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欧、美日作为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利益高度一致，但美欧、美日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上的利益分歧在近年来有加大趋势，在未来可能以正反馈作用影响其双边关系），既有联盟体系、非传统安全合作与文化认同等第三方因素的巨大合作利益导致安全完全合作，并对经济竞争关系进行缓和，其防务独立等因素的弱负面作用不构成双边关

① 王玉柱：《发展阶段、技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格局调整——兼论大国政治驱动的新区域主义》，第149页。

② C. Fred Bergsten and Russell A. Green, “Overview”, in C. Fred Bergsten and Russell A. Green e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Lessons from the Plaza Accord After Thirty Years*, Washington D. 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p. 4.

③ 徐康宁：《正确鉴史而知兴替：“广场协议”的真实影响与教训》，载《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6期，第118页。

④ 迈克尔·格林、帕特里克·克罗宁主编：《美日同盟：过去、现在与将来》，华宏勋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页。

⑤ 田凯：《论日美经济摩擦与安全同盟的互动》，载《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20年第24辑，第231页。

⑥ 朱文莉：《竞争性的相互依存：冷战终结前后的美日关系》，载《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第53~70页。

⑦ 牟伦海：《想象的同盟：战后美日同盟的文化起源探析》，载《日本学刊》2020年第6期，第126~153页。

⑧ 参见张业亮：《冷战后的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载《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第126~155页；赵怀普：《欧美学界美欧关系研究述评》，载《美国研究》2009年第3期，第127~140页。

□ 当代亚太

系的挑战，错位机制进行到一半而没有正式生成，从而维持了双边经济与安全良性联动并且持续至今，一定程度推进了国际体系正向演进（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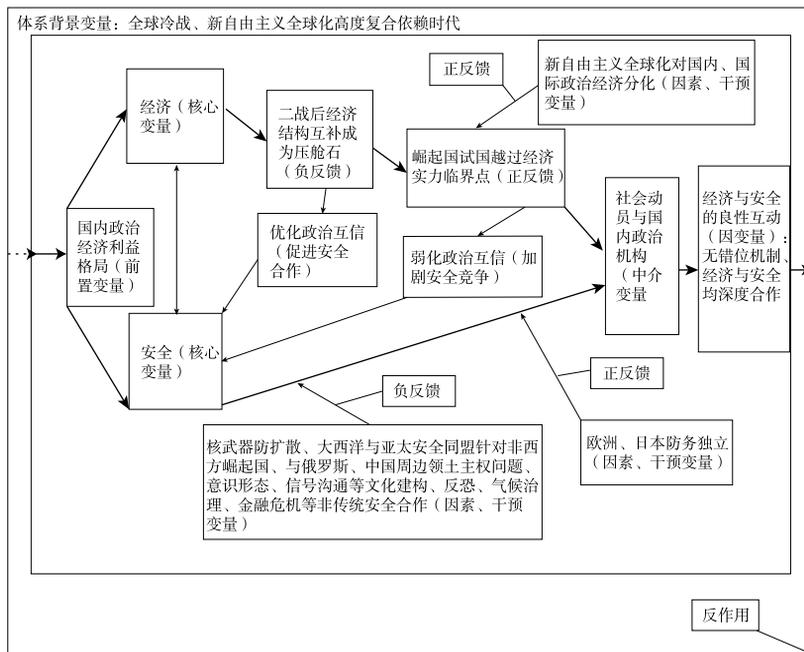


图5 美欧、美日经济与安全良性互动关系的动力机制 (1945年至今)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 应对中美经济—安全联动关系错位的大国战略竞争

基于以上比较案例的经验与中美关系自身演进的历史启示，美国需要避免在应对崛起国时出现规避风险与承担风险的战略失衡，^① 中国需要继续弹性塑造和平崛起的战略窗口期，^② 两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共同的责任，而整体上如何应对二者经济—安全联动关系错位导致的战略竞争关系，从而迈向经济、安全与文化多维演化的未来可从以下三点出发。

① Randall Schweller,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7-8.

② 秦立志:《窗口预期与崛起国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1期,第95页。

1. 中美经济合作的展望

一是推进两国产业结构深化互补。即便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发起贸易战在其国内也存在大量异议，美国对建立敌对中国的国际联盟也感到困难重重，^① 客观上两国在产业结构上依旧存在高度互补性。首先，就产业结构而言，美国经济高度金融化压缩实体经济发展，导致其依赖外部市场消费品进口，其巨额贸易逆差源自自身经济结构的内因。^② 即便是现任拜登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打造西方主导的排他性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联盟，单凭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市场规模以及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在全球制造业与全球市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③，就具备不可替代性。其次，就产业分布与地理分布而言，至少在农业（大豆）、能源业、高端制造业（包含半导体、计算机与汽车等）等行业、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和太平洋沿岸的金融业与高科技产业，以及南部能源与航空基地的得克萨斯州，美国都遭遇了反对贸易战的强劲反弹。^④ 2021年11月13日，美中贸易委员会联合24个产业组织向拜登政府施压，尽管认为中美经济结构性矛盾存在，但强调扩大对中国的豁免进口关税项目，因为仅在2020年，每个美国家庭已经为此付出平均额外1300美元的代价，^⑤ 这表明，美国政府对金融与农业利益集团的补偿与安抚面临限度。美国实际上也无法承受与中国经济完全脱钩的代价，东北部金融集团，尤其是西部沿海高科技集团都不能完全失去中国这一不可替代的市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没有因为贸易战缩小，也无法改变在货物贸易上对国外的高度依赖，贸易赤字重新开始上扬。最后，两国下一阶段经济合作可以借鉴特斯拉模式，即华尔街资本、硅谷技术、中国市场与上海制造结合

① “Review of the FY 2021 State Department Budget Request”, U. 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July 30, 2020,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hearings/review-of-the-fy-2021-state-department-budget-request-073020>.

② 且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金融资本对外投资三者来看，美国在服务贸易、对外投资获取利润上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参见蔡万焕：《经济金融化视角下的美国经济结构与中美经贸摩擦》，载《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1期，第51页。

③ 陈若鸿：《从效率优先到安全优先：美国关键产品全球供应链政策的转变》，载《国际论坛》2021年第5期，第135页。

④ “661 U. S. Companies and Associations Urge Administration to Avoid Tariff Escalation, Reach Resolution with China”, June 13, 2019, <https://tariffs.hurt.com/news/661-us-companies-and-urge-administration-to-avoid-tariff-escalation-reach-resolution-with-china>.

⑤ “Industry Letter on US-China Trade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https://www.uschina.org/advocacy/regulatory-comments-on-china/industry-letter-us-china-trade-and-commercial-relations>.

□ 当代亚太

的新模式，以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① 因为两国均无法在全产业链上独立于世界，完全脱钩对两国前景并不乐观，相反还有很多合作领域，2021年以来美国也对此提出中美经贸“再挂钩”设想（recouping）。^② 此前，由于政治互信程度不够等主观性扭曲认知导致了合作的停滞，中美需要将经济合作再度去意识形态化和泛安全化，促进经济—安全再度良性联动的大局，以避免经济完全脱钩的大国战略竞争关系。

二是推动第三方市场与安全合作。西方舆论界与政界倾向于对中国在第三世界的耕耘污名化为“新殖民主义”，但实际上，中美两国在这些第三方市场上仍然存在合作空间。例如，拉美地区的发展需求巨大，两国在开发性金融和地区发展上可以采取合作；^③ 亚太地区秩序存在单极多极并存的复合格局，也突出两国在第三方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有助于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建设。^④ 事实证明，美国“试图推动中美脱钩甚至搞所谓新冷战，严重破坏中美关系，严重损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违背当今时代潮流”。^⑤ 此外，中东地区的能源合作和非洲地区的原材料开发利用也存在双赢机会，中美在“在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能源开发以及电力设备等产业中打造了一系列重要合作项目，不仅推动了中美企业比较优势的互补发展，还有效对接了第三方市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⑥ 同样在第三方安全合作上，“中国应积极参与和创建地区安全机制，并建立各种‘中美+X’三边机制，以使双方及第三方保持信息同步沟通，避免误判”，^⑦ 克服多重合作挑战，^⑧ 促进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此外，中美关系也不是国际关系的全部，

① 此观点特别感谢李巍教授的有益启发。

② “Understanding U.S-China Decoupling: Macro Trends and Industry Impacts”,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october/what-they-are-saying-ambassador-katherine-tai-outlines-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ew-approach-us>.

③ 此观点特别感谢崔守军教授的有益启发。

④ 张蕴岭：《转变中的亚太区域关系与机制》，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3期，第6~11页。

⑤ 《杨洁篪在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视频对话时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21年2月2日，<http://www.chinaqw.com/yw/2021/02-02/284931.shtml>。

⑥ 吴崇伯：《中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实践、挑战与展望》，载《国际观察》2021年第3期，第44页。

⑦ 王俊生：《中美何以能和平共处？》，载《国际展望》2016年第2期，第132页。

⑧ 胡勇：《“中美+”三方发展合作的双重挑战及修复路径》，载《国际展望》2022年第1期，第115~134页。

中国仍然需要以“围棋战略思维”寻求侧面突破,^① 坚持发展与俄罗斯、欧盟等大国关系,^② 发展与国际组织、周边外交的关系和开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良性互动的整体性思维。高度全球化时代演化的复杂系统效应之一,就是尽管冲突范式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先性,但多次博弈背景的世界最终是和谐共生的,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不仅仅是两国的议题,而是全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③ 在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中美可以针对多个领域实现类似生物学上的“美美与共的趋同进化”。

三是以包容性制度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虽然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上推行了一些平行制度,^④ 但中国始终支持多边主义和基于公平互惠的经济合作,历史启示表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内嵌在更包容的政治、经济与安全架构下,彼此更容易和平共处。^⑤ 现有部分国际制度在较大程度上没有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寻求包容性改良,目的是更好地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而非修正主义,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与各国一道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崇高理想。面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对国际规范的反社会化趋势,中美需要以包容性制度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解决疫情下全球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治理等重大经济民生问题,共同推进国际体系的正向演化。

2. 真正开始的领域:中美双边安全合作

尽管近年来美国对华安全关系屡次触碰中国红线,但中美在地理毗连上没有古典现实主义式安全对抗,中国也没有试图扩大与加深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对抗。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克制,并树立清晰的互信原则:“一要明确底

^① Shih Chih-yu and Huang Chiung-chiu, “Competing for a Better Role Rel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o-US Rivalry and Game of Weiqi”,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25, No. 1, 2020, pp. 1-19.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全文)》,中国外交部官网,2022年2月4日, 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202/t20220204_10638953.shtml.

^③ 《习近平对世界如是说》,新华网,2015年11月23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1/23/c_128456200_3.htm.

^④ 针对不同议价能力的领域,可以按照是否创立新国际制度以及是否对既有国际制度进行重新解释和应用,可以将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分为替代、叠加、转换和偏离四种类型。参见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第75~105页。

^⑤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s Trap?* New York: Mariner Books, 2017, pp. 129-140.

□ 当代亚太

线，避免对抗；二要畅通渠道，坦诚对话；三要拒绝脱钩，保持合作；四要放弃零和，共担责任”。^① 因此，在拜登政府带来的可能性机遇下，中美应该先把战略关系稳定住，确保现有安全沟通渠道的有效畅通，再徐图改善，战略稳定是政治互信根本性问题，涉及两国关系长期稳定的大局。此外，传统安全的非零和性合作仍然是中美战略竞争管理的核心基础，^② 以此才能实现中美安全稳定的大框架，“包括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双方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等四根支柱”。^③ 这也需要双方领导层政治力量在安全领域的正向引导才能达成合作共识，^④ 实现合作行为，获得合作成果，排除第三方因素的干扰，同时避免安全竞争引发经济对抗，逆转经济—安全联动的错位机制。

3. 必要辅助机制：中美社会文化交流与全球治理合作

目前，中美大国战略竞争“仍在一个开放性国际体系中进行，使得中美两国能够维系足够的战略信任”。^⑤ 而中美在社会文化交流等领域利益高度关联融合，极大地促进了两国沟通与理解，“一些人出于一己政治私利和狭隘偏见竭力破坏中美关系，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注定是要失败的”。^⑥ 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而言，中美社会文化交流与全球治理合作这一辅助机制能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基于以下三方面：一是国际体系的开放性缓解体系压力并扩展双方的战略合作的空间；二是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可以加大中美关系之外的第三方因素正面影响力度，利于各类信号沟通、减缓国际格局的板块化；^⑦ 三是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有利于缓和双方对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

① 《王毅就当前中美关系接受新华社专访》，中国政府网，2020年8月6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20-08/06/content_5532729.htm。

② 刘丰：《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度与管理》，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0期，第27页。

③ 王政达：《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载《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5期，第79页。

④ 《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官网，2022年1月3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201/t20220103_10478507.shtml。

⑤ 包广将：《中美战略信任的维系：不对称结构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5期，第95页。

⑥ 《杨洁篪在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视频对话时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21年2月2日，<http://www.chinaqw.com/yw/2021/02-02/284931.shtml>。

⑦ 2020年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议》成功签订，尽管最终生效面临干扰，但标志着中欧双边关系的深化，以及冷战后欧洲与美国的战略互信在某种程度上上的裂痕，展示了中美关系之外侧面突破的可能。

倾向，深化两国社会相互理解，共同对世界政治负责。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世界历史的新基础之上，但“这种基础绝不是要将两国关系退回到相互孤立和隔离的状态，也不是要将两国关系推向武器化的相互依存，而是需要在重要领域确保相互依存”。^①同时，中美在抗击疫情、气候变化、^②反核扩散、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多个全球治理领域存在合作空间，将持续对双边关系的稳定发挥重要作用。总之，在全球化历史动能、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现实约束与以上领域共同推进的基础上，在保持充分战略耐心的引导下，中美关系更有可能通往经济、安全与文化多维共同演化。

五、结 语

基于世界政治学路径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范式等宏观理论，本文搭建一个大国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生成的宏观框架，并建立对应的类型学，以中美关系为核心案例进行追踪，以错位机制解释当前两国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生成。其理论启示在于，验证了大国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关系错位机制的生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完全错位机制的正面案例为美苏关系，无错位机制的负面案例为美英关系，机制进行到一半的半负面案例为美欧、美日关系，而中美关系是错位机制特殊的正面案例。基于中美不同历史文明的底蕴与国际体系高度复合依赖演化的现实，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上述大国关系历史案例存在时机与时序的不同，^③意味着这一错位机制存在较大的可逆性。对此，中国以及美国需要推进产业结构深化互补、推动第三方市场与安全合作（包含双边与多边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包容性制度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辅之以中美社会文化交流与全球治理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向经济、安全与文化的多维共同演化。

① 张宇燕：《确保相互依存与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52页。

② 《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全文）》，中国政府网，2021年11月11日，http://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111/t20211111_959900.shtml。

③ 社会科学研究中必须注意时空问题，因为不同因素在不同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便是相同的因素，在不同时序下出现的结果也不同，案例的比较意义不在于历史决定论。参见郝诗楠、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时序和时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2期，第95~105页。

□ 当代亚太

当前，由于美国政治经济精英不愿正视其政治上层建筑存在的基础性弊端，试图忽视全球化时代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普遍性困境，^① 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长期积累的问题^②进行错误的外部归因，^③ 加剧了中美经济—安全关系联动的错位螺旋。就目前而言，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仍然是一对未定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即将迎来双边关系的转折点，这一转折可能继续滑向美国擅长的大国战略竞争与两极对立的平行世界，但更可能开始一段竞争性共存。而中美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负面外溢效应直接影响亚太和全球格局，在这一过渡阶段，世界局势可能变得异常危险。但跨过中美关系这一临界点，加上中国始终以国内问题为优先方向：“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治理好自己，尽可能与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推进国际秩序的稳步改进，从而造福世界”，^④ 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坚持无霸权意愿、思想和实践，^⑤ 以及中国自身力量增长对维持世界和平的正面作用，最终会促使美国回到理性务实合作。就事实而言，中美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基本属性没有变、经济全球化历史动能以及全球公共事务治理中大国协调的必要性没有变。随着中国外交议程设定能力的增强（主动设定美方纠错与中方关切两份清单）、越来越成为双边关系中的自变量而非仅仅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因变量，^⑥ 双方应该共同推动中美关系进入经济深化合作与充分战略互信的合作阶段，这一实践必将给国际体系的演化带来稳定前景，也在知识生产上革新大国关系理论的生命力。

① 赵可金：《民主的困惑——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政治逻辑》，载《美国研究》2015年第1期，第35~53页。

② 美国政治的道统与治统已经出现危机，如汪仕凯探讨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同时出现，并且相互强化，造成美国民主政治衰落。参见汪仕凯：《不平等的民主：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4~31页。

③ 霸权与金融关系失衡是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国际力量相对衰落的重大根本原因。参见任琳：《金融与霸权关系的悖论》，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1期，第1~32页；卢凌宇、鲍家政：《从制造者到索取者：霸权衰落的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9期，第74页。

④ 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202页。

⑤ 《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21年9月22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2/content_5638597.htm。

⑥ 《中美天津会谈》，中国外交部官网，2021年7月2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wjbxw_674885/t1894973.shtml。

Studies, and a Post-Doctorate in Applied Economics at the Jinan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Liu Dexue is a Professor at Jinan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and Great Powers Competition: A Case Stud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Liu Xiaolong and Li Bin

Abstract: A traditional view of the func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holds that technological advantage can be infinitely enhanced when a state maintains the ability to set technology standards. Following this view,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states have spread the “China-threat theory”. It is argued here that competi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actors in the area of technology standards does not follow this pattern. Advantages in the areas of trade and technology that are based on technology standards are temporary and cyclical in nature,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gain a long-term monopoly relying solely on technical standards. In other words, the saying “winner takes all” does not apply in such cases. Competition can result in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which in turn can create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circles or barriers. Competition with respect to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may also bring about certain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as such governments may target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towards influencing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While so,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cannot salvage outdated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nor can it realize long-term monopolistic interests. The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illustrate that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Chinese companies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norms, and that there is no basis for Western actors to concoct a “China threat theory” around such efforts.

Key Words: Technology Standards; Great Powers Competition; Power; Technological Advantage

About the Authors: Liu Xiaolong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2018 class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Li Bin is a Professor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partment at Tsinghua University

On the Formation and Response of th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Dislocated Spiral Mechanism of Economy-Security Nexus among Great Powers

Zhou Chao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s in contemporary world politics is how great power strategic competition generat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response to this question,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general framework to explain it and builds a typology to compare negative, semi-negative and positive cases, providing an evolutionary explanation based on mechanism plus factors. The framework illustrates how the primary factor driv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dislocation

mechanism of economic and security nexus. This dislocation is driven by an underlying background assumption of complex mutual depende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resulting from globalization and their domestic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Over time, continuous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ccurs between core elements of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tates, resulting in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driving it to engage China in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mpetition. These are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that ultimately result in a spiral towards an im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and security. That is, economic competition intensifies security tensions and weakens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s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alculus ultimately overwhelms the logic of economics. In the e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emerges between the two states as a result. Thus, China needs to learn carefully from historical lessons in crafting its response to these trends. It should endeavor to deepen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s of the two countries, enhance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ird country markets, and enhance and deepen cooperation betwee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bilateral security. At the same time, this needs to be supplemented by so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This will enable Sino-U. S. relations to move in the dire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co-existence, which can have revolutionary implications for the great power relations in the human history.

Key Words: Great Power Relations;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Sino-U. S. Relations; The Mechanism of Dislocated Spiral in the Economy-Security Nexus; Social Evolution

About the Author: Zhou Chao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2020 class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 Examination of Applied Policy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Trends ,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ed Evaluation

Que Tianshu, Yan Shanshan and Wang Luyao

Abstract: As a strategic technology and leading driver of a new wave of revolutio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field is a focal point of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on for all states. In the global contest in this field, the United States has dominated the global game with its outstanding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military strength. The first-mover advantage has made the United States an absolute technological hegem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olicy tools has been continuously adjusted with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AI development in other countries. In order to objectively and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security orient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policy tools in the field of AI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rticle classifies them according to the goals of policy tools, discusses their specific methods, core biases and application areas, and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of policy tools in the field of AI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ignificant stage characteristics presented by the orientation, implementation